

# “读书界”的知识、性与逃离

——读陈映真《唐倩的喜剧》

徐 嘉

**内容提要** 在美苏冷战、白色恐怖以及亲美反共的时代背景下,陈映真作为知识分子,对现实和未来感到迷茫失落。他于1967年发表于《文学季刊》杂志的小说《唐倩的喜剧》,围绕“读书界”三个典型的男性人物及周旋其间的女主角唐倩展开,展现了六十年代台湾首善圈的“群魔乱相”。小说以知识分子的精神、知识和性的异变状态以及他们“逃离”台湾为观照,充分展现了当时知识分子空洞、迷惘甚至堕落的窘境,从而引发了关于1960年代台湾地区以至整个中国的知识分子该如何抉择的思考。

**关键词** 陈映真 《唐倩的喜剧》 知识分子 性 逃离

DOI:10.16228/j.issn1008-0163.2017.02.012

## 一、导言

1967年1月,陈映真在台湾《文学季刊》第二期发表了小说《唐倩的喜剧》,这是他在小说《最后的夏日》(1966年10月)后于《文学季刊》发表的第二篇小说,而此前的几年(1963-1965),陈映真的创作场域是《现代文学》杂志。谈及这两个杂志,陈映真这样说道:“《文学季刊》和《现代文学》毕竟有些不同之处,后者是全心全意地往西方走,而前者一直在寻找自己的道路,或者主观上愿意走自己的路。”<sup>①</sup>作为一名“思想性”与“自主性”<sup>②</sup>兼备的作家,同时他自知自己是一位“文学工具论者”<sup>③</sup>,《唐倩的喜剧》无疑是“主题先行”式地表达作者(包括政治在内的)思想的工具,小说设定在1960年代美国发动越南战争(1961-1973)、大陆“文革”初期这样具体的时代背景,而更广阔的写作背景则是如赵刚先生所说的“它露骨地、尖锐地展现出在全球冷战、白色恐怖、戒严统治,以及举国上下一致亲美反共的时代脉络下,知识分子的精神与知识状况。”<sup>④</sup>生活在这政治复杂错综、文化进退失据年代的知识分

子,难免经历从“理想的希望”到“现实的幻灭”最终“自身的堕落”的身心失望的过程,而《唐倩的喜剧》正是展现了这样一种时代脉搏,不论是“存在主义者”老莫、“逻辑实证主义者”罗大头,亦或留美青年工程师乔治 H. D. 周,都难逃这时代之网。在政治动荡、文化西化的风口浪尖感到一种“自负的迷茫”和“满足的堕落”,他们的言谈举止在读者看来甚至有些病态。时至今日,这些文化现状依然广泛存在于台湾的知识界,甚至当前大陆的知识界。

关于《唐倩的喜剧》所表现出的问题和意旨,前人大多已经论述得透彻全面。赵刚《唐倩的喜剧——党国、知识分子与性》用四部分囊括了三名男主人公所代表的1960年代台湾“学场现形记”,深刻全面地剖析了这种现象背后的政经原因。有意思的是,赵刚的另一篇论文《从陈映真小说看1960年代台湾知识分子的“离开”情结》<sup>⑤</sup>恰好可与此文对照,进一步阐释当时的台湾知识分子的“赴美”与“崇美”现象背后的根源。陈思和、罗兴萍从《唐倩的喜剧》的艺术手法联想到茅盾的小说,认为他们都是“借助于男女私情的暖

味故事来暗示思想的冲突”<sup>⑥</sup>，对于唐倩这一形象，他们认为陈映真并不鄙视，“作家对于这样一个丰富饱满、甚至令男人恐惧的女性，是怀有同情的，最多是一种善意讽刺”<sup>⑦</sup>。与这一观点截然不同的是台湾蔡孟莉的硕士论文《陈映真小说人物角色研究》<sup>⑧</sup>，该文认为唐倩内在里是一个崇洋媚外、无知肤浅的知识分子。

当我们将《唐倩的喜剧》放置在陈映真 1960 年代的作品之列，如《一绿色之候鸟》、《兀自照耀着的太阳》以及《最后的夏日》等，会发现这部作品形构出当时台湾（本省和外省）知识分子群像，也是陈映真从早期的“现代主义”创作倾向转而观照具体的社会现实和文化状态的重要转变——从早期由青春、梦想和愤怒构筑成的个人伤感主义和悲观主义小说，转而增添了嘲弄、讽刺和批判的色彩。“究其根源，他受到激动的‘文革’风潮的影响，实甚明显……受到思想渴求实践的压力，幼稚地走上了幼稚形式的组织的道路。”<sup>⑨</sup>在反复细读文本后，小说《唐倩的喜剧》仍有诸多内涵值得继续深挖：对于女主角唐倩作者究竟包含了怎样矛盾的态度？作者将自己放置在哪类知识分子的立场上？文中的批判是否指涉自己？对于知识分子变态的“性”行为以及赴美崇洋的“逃离”，作者又是带着怎样的反思态度？结合当时的历史情境去讨论这些问题，或许更有益于读者解读当时的陈映真以及当时的台湾知识分子圈层。

## 二、被西化理论套住的台湾知识分子形象

对比《一只绿色之候鸟》中几名知识分子（包括本省年轻知识分子和外省籍老教授）对传统的反叛、追求自由民主以及打倒国民党的欲望，《唐倩的喜剧》更多的是侧重对三位男主人公在“知识理论”以及“精神追求”方面的批判。《一只绿色之候鸟》中的三位男主人公：赵公、季公和“我”皆为外文系出身，他们与《唐倩的喜剧》的三位男主人公一样，同为受到来自西方思潮和理论冲击的台湾知识分子。追溯陈映真描写外省知识分子（如《一只绿色之候鸟》中赵公、《唐倩的喜剧》中罗大头）的缘由，或许和他本人曾在台大英文系有关，当时的外省人给台湾带来了西方思想动向，

他们常与英文打交道，与此同时也给陈映真带来了巨大的冲击。

不难看出，贯穿整篇小说的是一片低气压——台湾知识青年的集体困境和未知出路。正如赵刚所述“虽然思想可以是武器、知识可以是力量，但对小说的主人公莫夫子、罗先生而言，他们的知识与思想并没有一个外在的目标，而是自我消费性质的，拿来和小小的读书界的其他成员，在小小的咖啡杯的烟雾上闪战腾挪。”<sup>⑩</sup>全文提到不止三次“小小的读书界”，笔者以为，用“小小的”来限制当时风气低靡的“读书界”，一是表达了陈映真对于当时首善圈囿于一隅的、脱离台湾社会现实且沉浸于拿来主义理论的批评，另一个原因则可能是缩小他对于知识界的批判范围，以保留对知识界未来的出路的乐观。

相较于“实证主义者”罗大头，我们不难看出陈映真对“存在主义者”老莫的抨击更为不遗余力。小说中，老莫一出场便是一副苦大仇深的样貌，而唐倩最初便是被老莫“那种知性的苦恼的表情给迷惑住了”<sup>⑪</sup>，他总是“愤愤地”“疾声厉色地”“忧伤地”大谈“存在主义”并抨击教会，他对“萨特的人道主义”情有独钟，实际上他的领悟就是自相矛盾的：他认为读书界包括他自己的朋友在内，“都误把存在主义看做悲观的、冷酷无情而且绝望的东西”<sup>⑫</sup>，但是他言谈中却并没有跳脱出他所谓的“悲观、冷酷无情”，例如他说“我们被委弃到这个世界上来，注定要老死在这个不快乐的地上。”<sup>⑬</sup>这句话竟惹哭了唐倩，因为她回忆起被父亲遗弃的母亲以及自己“暗淡”的童年，这种论调立马唤醒唐倩内心深处的认同，于是她抛弃了诗人男友于舟，摇身一变成为“存在主义的教主”老莫身旁“美丽的使徒”了。他用所谓的“反神的存在主义”和“罗素的性解放论”来抨击基督教的“伪善”，实则是因为他在青春期因疯狂恋上姨表妹而遭到了姨妈的反对<sup>⑭</sup>，这种因私欲得不到满足而用“存在主义”为自己辩护且佯装出一副“不安”且“伟大的痛苦感”，确实是一种硬生生套用西方理论来为自己畸形思想贴标签的滑稽把戏，这一点在小说后面他看待唐倩怀孕以及死伤的越共的麻木、冷漠可以得到更多的印证<sup>⑮</sup>。

笔者认为,陈映真对待小说的第二个出场人物罗大头是有着某种含糊不清的同情和理解的,这与他对老莫反共亲美的“伪善者”批判不同。如果说对于老莫们的“现代化的伪善的理论”,陈映真认为那是一种“去势的”(被阉割的)、毫无出路的畸形人物,那他对于罗大头最终的死亡则是愿意去作详细地、说得通的注脚的。然而,并不能否认的是,陈映真对“新实证主义”的罗大头仍然是抱有批判和质疑的态度,小说中的一段旁白直接向我们揭穿了罗大头这类“天生的犬儒的质疑论者”的“虚荣”:

这样一来,知识界中一大批天生的犬儒的质疑论者,便欣然地获得了一种似懂非懂的理论和方法。被这种理解和方法武装起来的质疑派,一律都显得热爱真理,而且由于太过于热爱真理的缘故,不得不成为一个质疑论者,应用这种质疑的利刀,显然有两个好处:第一,它能提供一种诡辩的诘难所获得的快乐;第二,它使自己从消极的、守势的地位,转而成为积极的、外侵的质疑者。于是质疑不再是一种苦闷,一种忧悒,而是一种虚荣,一种姿势。<sup>⑩</sup>

我们可以说,“新实证主义”既给予了罗大头某种“新生”,又导致了他最终的自杀。从小说中我们得知,童年时期在老家经历了江西苏维埃政权的土改运动而家破人亡的罗大头,以为“新实证主义”是自己用来面对现实问题的一把利器,“这个东西恰好从正面供给他逃避,‘勾销’一切使他的知识的良心发生疼痛的过去的和现在的难结之理论和方法,从而把他的知性的弱质,整个儿给正当化了”<sup>⑪</sup>。然而正是这样一个“纯粹理智的逻辑形式和法则的世界”,罗大头自诩在其中获得了“自由”,实则却是一种束缚和毁灭。他用质疑来观察唐倩身上老莫的影子,而当这些“实证逻辑”无法解决时,他就“止不住泪流满面”,这种时而“脑筋冷静”时而“泪流满面”的分裂人格,以及他从最初作为“质疑主义的先锋”而获得了某种自由和新生,到最后因为“一个严重的质疑”而发狂自杀,不正是罗大头用“新实证主义”自取灭亡最好的佐证吗?罗大头从前期一位进步青年形

象,沦为最终的失败者,究其根源是他没能将新式理论与台湾现实结合,这也是陈映真笔下大多数知识分子失败的原因,他们注定是走投无路的。

可以说,不论是对伪善、虚无、嗜血的老莫的无情鞭笞,还是对矛盾、懦弱、走投无路的罗大头的不满与同情,都是陈映真对60年代台湾知识分子最敏锐、真切的刻画和反省,而这种深刻的认知又必须放置到当时国民党强权统治、经济初步发展、两岸分离以及全球冷战的结构格局中去解释。罗大头这一类陷入绝望的知识人,不但是一代青年读书人的剪影,或许也是陈映真对自己的指涉,包含着在飘摇的、动荡的、诱惑的、虚无的时代脉搏下知识分子该如何厘清自己的血脉、如何挣脱西化理论的枷锁等严肃的思考,“一个美丽、崇高的理想常常带来丑恶而寂寞的幻灭;一个美丽而动听理想,又往往成为压迫者或劫夺者借以施行压迫和劫夺的糖衣”<sup>⑫</sup>,而这种“找不到出路”的“本土”知识分子,终究不得不转变成/让位给留美青年乔治周。

### 三、男性知识分子的“无能于性”与“无能于爱”

小说在知识分子的“知识”之外添加了三个男性和唐倩的性爱线索,而这种夹带于“知识探讨”后却颇不愉快的性经验,不免给读者一种“灵”与“肉”分离的畸形体验。“求爱却不能爱”似乎是陈映真前期作品的母题,不论是《我的弟弟康雄》中的康雄陷入一场不伦之恋而痛不欲生,还是《最后的夏日》裴海东虚荣又恶毒地面对喜爱的女人,亦或《加略人犹大的故事》看似美好的爱情却使犹大内心感到一股真切的挫败,这些陈映真笔下失掉爱的能力的男性,恰恰与他们失掉的理想相照应,此时女性的情意与肉体往往成为男性畸形迷恋着的“温柔乡”。

这种“无能于爱”首先在老莫身上表现得淋漓尽致,不久唐倩便在他身上发现了“知识分子所不能短少的伪善”<sup>⑬</sup>,老莫在床第之间如“沉默的美食主义者”一般的兽性使唐倩害怕“他的饕餮的样子,使伊觉得:性之对于胖子老莫,似乎是一件完全孤立的東西。他是出奇地热烈的,但却使伊一点也感觉不出人的亲爱。”<sup>⑭</sup>读来让人觉得

更加恐怖的是,每当老莫享用完他的“饕餮盛宴”从“半虚脱的状态中”恢复后,竟可以立马继续之前的讨论“他于是为自己和唐倩点上香烟,把被单拉好,继续说‘而存在主义的人道主义,便是这种永恒的创造性的开展!’等等。”<sup>②1</sup>这看似细微平常的动作描写,恰恰让人感到老莫那种无能于爱的冷漠可怖。此外,他又是自私万分与十足胆怯的,当唐倩在她的创作中穿插露骨地性爱描写时,老莫又“私下苦恼万分”。直到得知唐倩怀有自己的孩子时,老莫彻底暴露了“慌张”,他竟“柔情似水”地对唐倩说,孩子会破坏他们在试婚思想上伟大的榜样,他逐渐被唐倩“强韧的悲苦”和“大地一般的母性的沉默”所震慑,而“感觉到一种无能在威胁着他”,最终蔓布着一种“去势的恐怖感”<sup>②2</sup>,正如黎湘萍教授所说“知识分子的性生活里的那种令人恐怖和焦躁不安的非人化的性质,无不是由于深藏于他们的心灵中的某一种无能和去势的恐怖感所产生的。”<sup>②3</sup>这种由男性主体所产生的被阉割过的爱的能力和他们在“智识”上的残缺一道,构成了那个年代知识分子看不到出路的焦灼和残废,他们在“知识”和“性”两方面都“欲求不满”却依旧不罢休,从而走入恶性循环的怪圈,“‘去势感’是陈映真小说中常见的男性精神构图,《唐倩的喜剧》中,这些男性知识分子对知识的虚妄感,对理想的荒败感,大多转化为性贪婪与性焦虑,交替呈现,愈贪婪愈焦虑,愈焦虑愈贪婪”<sup>②4</sup>。

再看罗大头,他对于唐倩和老莫的过去一直难以释怀,每每想到唐倩“在床第间的一些奇怪的小动作”,他就怒不可遏,显然他是以一种“较量”的视角看待自己和唐倩之间的性爱关系。如果说老莫对待性爱是以一种作为男性主体的优越感而去肆虐、去攫取,那么罗大头则是将唐倩不自觉地摆放在对立面,时常感到愤怒和醋意,然而他们最终都被唐倩那种女性所表现出来伟大的母性所打败。当罗大头运用他的“新实证主义”去怀疑一切的时候,不可避免地开始怀疑自己的男性能力,从而“换来无穷的焦虑、败北感和去势的恐惧”<sup>②5</sup>,这种“去势感”同老莫的一样,在女性相对“完全自由”的时候显得更具悲剧性和灾难意味。

40

而到了乔治周,他也难逃“去势”的窠臼。就在他和唐倩订婚那夜,他便成了“一个极端的性的技术主义者”,那种机械的、挑衅的、无情的行为立马让唐倩觉得羞耻和愤怒,不久她便得出一个适用于三位男主角的结论“知识分子的性生活里的那种令人恐怖和焦躁不安的非人化的性质,无不是由于深在于他们的心灵中的某一种无能和去势的惧怖感所产生的。”<sup>②6</sup>虽然乔治周在美国学习了先进的工程技术,但是作为一个第三世界男性知识分子,他终究在第一世界面前败露出一种蹩脚的造作和佯装的优越,这一点体现在他的“无能于性”上无疑。

当我们为三个连续的“去势”所感到悲哀时,我们不禁要问:到底是什么使陈映真笔下的男性“无能于爱和性”?对于这个问题,赵刚是从1960年代台湾在父权的、阳刚的、横暴的类法西斯体制<sup>②7</sup>来解释的,他认为陈映真总是把男性知识分子的性与两性,置放于国民党政权、国共内战、两岸分断,以及全球冷战体制的关系结构之间<sup>②8</sup>。笔者以为,要剖析男性的爱与性无能,或许要从他们的对立面——“女性(母性)”谈起。陈映真早期小说中的女性往往是平面的、符号化的,是一种物化了的“他者”,以投射男性这个去势、不伦、堕落的“主体”,虽然《唐倩的喜剧》可以说真正展开了几段饱满、立体的男女关系,但究其对唐倩的描写,仍是以“他者”形象出现:小说大多从男性视角出发,极少展现唐倩的内心独白,这是当时典型的女性与男性关系描写,正如大陆作家张贤亮的小说《男人的一半是女人》,同样将男性作为主导,女性只是男性获得新生或毁灭的催化剂。而同为催化剂的还有《一只绿色之候鸟》中的绿鸟,它来自北欧,作为从域外带来启蒙思潮的新物,它与唐倩一样,在某种层面上都象征着给男性带来某种来自外部世界的刺激、召唤和讯息,他们都使小说主人公获得觉醒和自我认知,同时也促使他们在畸变的新旧冲突中走向灭亡。

#### 四、留美潮中的“逃离”与“逃不离”

作为一位有着敏锐文化自觉的作家,陈映真早在1960年代就发现“台湾不论在社会上、经济

上、文化上都受到东西方强国强大的支配。在文学上,也相应地呈现出文学对西方附庸的性格”<sup>29</sup>。就连陈映真本人也承认自己的“崇洋媚外”。在《文学季刊》创作时期,他曾把一些不必要的英文字眼掺杂在文章中,忧虑却坦然地指出台湾这种经久不衰的现象“当时,我对西方的影响已经有了反抗的意思。可是,即使如此,我还是乐此不疲,甚至到今天,有时候和人讲话偶尔还有几句英文单字。这是一种心态,是整个文化空气之下,我们的处境。”<sup>30</sup>为何1960年代的台湾菁英分子偏爱“逃离”台湾,如《唐倩的喜剧》中的乔治周和唐倩?他们是否真的能安身立命于第一世界而没有“不适感”?换句话说,他们是否只是换了场域延续他们作为第三世界子民的焦虑和沉沦?要解释当时台湾知识界的“出走”,或许还要从当时台湾的政治经济状况谈起。

1960年代初期台湾的经济恰逢起步,市场需求仍不大,资本主义消费市场刚刚显现,就业机会缺乏,且大多知识分子未能摆脱自古以来中国读书人“学而优则仕”的从政理想,他们在台湾苦于获得契机以施展抱负;另一方面,1960年代李敖、柏杨等对中国传统文化的批评并主张西化的“文化论战”在青年知识界掀起波澜。此外,多年的戒严体制、高压政治使得许多知识分子对“自由”抱有美好的想象,而美国则是这种“自由的想象”的具象化。除却经济、文化原因,台湾知识分子的“逃离”还在于两代人的断层、隔膜。从陈映真的小说《家》《死者》到王文兴的《家变》,都描写了父子两代之间的尖锐冲突和不可调和的矛盾,而这种矛盾又是“内在于国共内战的纠缠于历史遗留的现在进行式之中,并具体展现为一种不甚寻常的代间断裂的文化事件”<sup>31</sup>中的。因此便有了1960年代台湾的“留美潮”,大批青年知识分子“逃离”:“在六十年代,美国自由主义被当时‘进步’知识分子奉为经典,美国的流行音乐、美国的抽象主义、超现实主义艺术和文学支配台湾的文艺界达数十年之久。大量的留学生从六十年代起涌向美国,并滞留不归。”<sup>32</sup>

落实到小说中,我们首先来看被美国“加工”过的乔治周。乔治周眼里的美国有一种“无法想

象的自由”,从他口中说出来的“自由”具体是怎样呢?无非是美国的工会帮车主打开油箱盖子加油、“没有人干涉你;你爱怎么样,就怎么样”、美国小伙子可以持枪自杀、和丹麦女郎谈恋爱等等,可见这种“自由”是多么肤浅且缺乏深刻理解。乔治周光鲜洒脱的言语下,隐藏着一种弱小民族在第一世界里的深深自卑感,在他极力用语言掩饰的情况下还是不自觉地露出了马脚,他对唐倩(亦或是对自己)说“国籍或民族,其实并不重要。我们该学会做应世界的公民。”<sup>33</sup>他为何要强调“国籍或民族,其实并不重要”呢?只有一种解释,就是他的国籍/民族身份为他在美国的生活带来了不小的麻烦,因此他才需要特地强调这一点,正如小说中他在唐倩的追问下,也承认了在美国作为一个华人的确“是一种负担”。

再来看唐倩,小说中多处线索可以看出她精心乔装是为了攫取乔治周的欢心,不得不说是费尽心思的。自从“那些空虚的知性、激越的语言、紊乱而无规律的秩序、贫困而不安的生活以及索漠的性”<sup>34</sup>让唐倩感到疲倦不堪时,乔治周口中编织成的“自由、有序、富足”的美国梦正好填补了唐倩的幻想,于是她“经过分析和计算”知道乔治周的刻苦俭约,并让自己表现出“得体的俭约”以让乔治周满意;她牢记乔治周的对于妻子和情人的双重标准并努力实践之,“为了要证明自己是个贤淑的妻子,唐倩也直到订婚的那夜,才答应委身于他”<sup>35</sup>。而唐倩最终也运用她的“狡黠和善良”通过乔治周这块失了用处的跳板,成功嫁给美国军火物理学博士,最终在那片“新天地”里“快乐得超过了她的想象”。在这部小说中,陈映真将唐倩视为一个讽刺台湾知识界的工具,如同《最后的夏日》里的李玉英一样,是“一张酸碱试纸、一付显影药、一道催化剂,或(也许有点过当)一面照妖镜”<sup>36</sup>,用陈映真自己的话来说就是“我以唐倩来讽刺当时台湾知识界流行的各种外来流行论述,什么存在主义啊,逻辑实证论啊,唐倩就像是一个工具一样,周旋在几个流行的派别之间,跟不同的派别的泰斗谈恋爱,最后跟一个在美国做生意的谈,就把从一堆情人一脚踢开,变成美国公民了。”<sup>37</sup>而对于唐倩(具体形象)的塑造,通

过反复咀嚼小说,可以看出作者对她的态度是有着明显转变,如果说在她与老莫一起时展现的母爱、与罗大头一起时表现的包容时陈映真的态度还是中立甚至有些同情和欣赏的,那当她狡黠地利用乔治周逃离台湾来到美国时,尽然都是讽刺和怨愤,小说真的是想通过男性的“悲剧”来衬出唐倩的“喜剧”吗?显然不是,正如吴舒洁老师所认为的“环舞于‘读书界’各种男性之间的唐倩,以她的自由和快乐嘲讽着男性的去势焦虑,却也始终无法栖息于一段亲密关系里。”<sup>⑧</sup>

作为一名“死缠烂打”的左翼作家,直面并书写1960年代知识分子的堕落和迷茫,只是陈映真“为社会”“为人生”创作的起点。面对岛内紧张的政党氛围、大陆“文革”的巨变、第一世界的文化经济冲击,陈映真是清醒的,也是迷茫的,特别是面对当时被美国全方面影响的台湾,面对不断“逃离”台湾的知识分子,他在无奈中说出了自己的希冀“如何在中国、东亚和第三世界的近现代史的结构中再思考台湾前去的道路,努力从‘美国结’和亲崇美国、轻视第三世界这个二重结构中挣脱出来,在中国历史的现代中,在中国自己的民主、自由、独立的运动中,争取自己的地位,恐怕是台湾中产阶级党外运动今后阶段中一个重要的课题吧。”<sup>⑨</sup>而陈映真在几十年前提出的这个思考,在当代的台湾甚至大陆,依然是一个绕不开的话题。正如《唐倩的喜剧》,在面对一系列大历史背景时,尤其面对天罗地网般的西方(美国)文化,知识分子或在台湾摆弄着西化理论来为自我私欲作注脚却无疾而终(如老莫们),或因理想覆灭而在新式理论的陷阱中被逼发狂(如罗大头们),亦或“逃离”台湾来到美国却显得愈加卑微和不协调(如乔治周们和唐倩们),他们终究“逃不离”第三世界根深蒂固的文化捆绑和弱小民族尴尬的自卑。而清晰目睹这一切的陈映真,他的意义就在于,非但没有放弃中国文化的未来,反而在这种“欲逃离”却“逃不离”的现实挣扎中,一直试图探索新的出路。

①②③陈映真《文学来自社会,反映社会》,《陈映真文选》,三联书店2009年版,第107、111、107页。

- ④⑨陈映真《后街》,《陈映真文选》,三联书店2009年版,第27、22-23页。
- ③⑦陈映真《我的文学创作与思想》,《陈映真文选》,三联书店2009年版,第45、51-52页。
- ④⑩⑲⑳㉑㉒㉓㉔㉕㉖㉗㉘㉙㉚㉛㉜㉝㉞㉟㊱㊲㊳㊴㊵㊶㊷㊸㊹㊺㊻㊼㊽㊾㊿赵刚《唐倩的喜剧——党国、知识分子与性》,《橙红的早星》(台北)人间2013年版,第211、212、227、229、212页。
- ⑤⑩赵刚《从陈映真小说看1960年代台湾知识分子的“离开”情结》,《研究与批评》2016年第2期。
- ⑥⑦陈思和、罗兴萍《试论陈映真的创作与五四新文学传统》,《文学评论》2011年第1期。
- ⑧蔡孟莉《陈映真小说人物角色研究》(高雄)国立高雄师范大学国文学系2012年。
- ⑪⑫⑬⑭⑮⑯⑰⑱⑲⑳㉑㉒㉓㉔㉕㉖㉗㉘㉙㉚㉛㉜㉝㉞㉟㊱㊲㊳㊴㊵㊶㊷㊸㊹㊺㊻㊼㊽㊾㊿陈映真《唐倩的喜剧》,载《忠孝公园》,江苏文艺出版社2012年版,第49、49、49、52、58、61、53、53、54、56、63、71、67、65、70页。
- ⑮对这两部分内容的阐释,赵刚老师的《橙红的早星》(第218-222页)中已有较为全面有力的论述,笔者在此便不做赘述。
- ⑰陈映真《最牢固的磐石》,《陈映真文选》,三联书店2009年版,第93页。
- ⑱黎湘萍《台湾的忧郁》,三联书店1994年版,第179页。
- ⑳杨翠《献祭的圣杯——陈映真小说中的女性救赎意象》,《陈映真创作50周年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台北)文讯杂志社2009年版,第114页。
- ㉑㉒陈映真《美国统治下的台湾》,《陈映真文选》,三联书店2009年版,第248、255页。
- ㉓吴舒洁《左翼的信仰之难——读陈映真〈加略人犹大的故事〉》,《中国现代文学》2015年12月,第38页。

参考文献

1. 陈映真《忠孝公园》,江苏文艺出版社2012年版。
2. 陈映真《陈映真文选》,三联书店2009年版。
3. 黎湘萍《台湾的忧郁——论陈映真的写作于台湾的文学精神》,三联书店1994年版。
4. 赵刚《橙红的早星》(台北)人间2013年4月。
5. 赵刚《从陈映真小说看1960年代台湾知识分子的“离开”情结》,《研究与批评》2016年第2期。
6. 吴舒洁《左翼的信仰之难——读陈映真〈加略人犹大的故事〉》,《中国现代文学》2015年12月。
7. 杨翠《献祭的圣杯——陈映真小说中的女性救赎意象》,《陈映真创作50周年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台北)文讯杂志社2009年版。
8. 陈思和、罗兴萍《试论陈映真的创作与五四新文学传统》,《文学评论》2011年第1期。
9. 蔡孟莉《陈映真小说人物角色研究》(高雄)国立高雄师范大学国文学系2012年1月。

作者简介:徐嘉,两岸关系和平发展协同创新中心、厦门大学台湾研究院文学所研究生。